



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天皇制和基督教

杨熙楠 铃木正三 / 主编 土肥昭夫等 / 著 查常平 / 译

THE EMPEROR SYSTE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MODERN SOCIETY

华夏出版社



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天皇制和基督教

杨熙楠 铃木正三 / 主编 土肥昭夫等 / 著 查常平 / 译

THE EMPEROR SYSTE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ESE MODERN SOCIETY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天皇制和基督教/(日)土肥昭夫等著;杨熙楠、铃木正三主编;查常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3

(历代基督教思想经典文库)

ISBN 978-7-5080-4148-3

I. 现… II. ①土… ②查… III. ①天皇制度-研究-日本-文集 ②基督教-研究-文集 IV. D731.321-53 B9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9458 号

本书获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风书社)授权出版简体字版

Published with the aid of Tomisaka Christian Center in Tokyo

in providing sponsorship for this work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80×1230 1/32 开本 12 印张 284 千字

2007年3月北京第1版 200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内容介绍：

本书选自已经在日本公开出版的几部著作：《近现代天皇制》、《天皇制神学批判》、《大尝祭》，属于十位日本著名基督教学者的文章。其主题，正是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1868 - 1945）天皇制与基督教的关系，以此为切入点向我们展示了日本在近百年的精神文化、制度文明的演进史的一个侧面。这些日本学者思考的问题，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今天的日本人以及日本如何从前现代顺利进入现代社会，具有实质的启发意义。

译者简历:

查常平, 笔名西美正, 1966年生, 重庆长寿人。博士, 著名批评家、人文学者。1987年在四川大学、1990年在四川师范大学、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日语、美学、基督教, 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学术方向为艺术评论、历史逻辑、圣经研究。人生定向为以信仰为基业、以教师为职业、以学问为志业、以批评为事业、以翻译为副业; 以原创性的逻辑历史学阐释人类历史的逻辑、奠立汉语人文学发展的内在根基为学术理念。先后发表“感性文化批评范式”、“什么是逻辑历史学”、“橄榄山对话的历史逻辑及其救赎意识”等学术论文60多篇, 出版《日本历史的逻辑》(专著, 1995, 成都)、《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一, 译著, 2005, 北京); 主持翻译《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上、中、下三卷(2004, 北京)等, 主编《人文艺术》论丛六辑, 策划“本源·生命”(1997)等艺术展。曾经任职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1990—2001), 现供职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王 昆

整体设计:

一点印象
yidianren@126.com

目 录

第一章	近代天皇制与基督教	
	——从颁布帝国宪法到中日甲午战争/土肥昭夫	1
第二章	“大正民主运动”与贺川豊彦	
	——和天皇制意识的关联/仓桥克人	100
第三章	“满洲事变”中的思想家吉野作造/松尾尊允	133
第四章	河上肇与吉野作造论国家、天皇、民众/今井清一	
		171
第五章	绝对天皇制下巴特神学的接受/雨宫荣一	211
第六章	神学社会伦理学角度的天皇制考察/大崎节郎	236
第七章	从国民教会的理念看基督教国家与天皇制国家/塚田理	
		270
第八章	神社问题与圣洁教会/山崎鸺夫	298
第九章	无邻人的天皇制与基督教/铃木正三	322
第十章	对天皇制的神学批判	
	——基督的王权与世俗的王权/莲见和男	349
	译者后记	374

第一章 近代天皇制与基督教

——从颁布帝国宪法到中日甲午战争

土肥昭夫

一、序言

本章将要叙述的内容为：在从颁布帝国宪法到中日甲午战争的时期，基督教如何应对围绕天皇制而引发的各种问题？

19 世纪 90 年代前后，天皇制的大体结构已经确定下来。藩阀政府筹备建立帝国议会，使用怀柔与镇压的双重手段瓦解自由民权运动，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最后，1889 年 2 月 11 日，藩阀政府颁布了这部宪法。该宪法认为：唯有天皇拥有唯一绝对的统治权力，文武官僚只能辅佐天皇的这种统治大权。在这样的意义上，天皇的统治可以说是绝对性的；同时，它也可以理解为立宪式的统治，因为，天皇客观上依照宪法行使统治权，而宪法规定了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天皇君临而不统治”，文武官僚在天皇之名下赋予自己的政治行为以权威。总之，“万世一系的天皇”之类神话性的语句，“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之类贵族式的表达，显示出天皇

2 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天皇制与基督教

不可动摇的权威与统治的神圣性。就在颁布宪法的同一天，藩阀政府制定了皇室典范，即确立皇位继承等的皇室制度的条例。可是，即使天皇制这样以法律条文的方式确定下来，这也并不意味着：日本国民没有形成与之相对应的对天皇、天皇制的意识。为了培养出忠心于天皇制的臣民，1890年10月30日，政府颁布了“教育敕语”。该诏令声明说：要以万世一系天皇的德治与臣民的忠孝为日本国体的精华；天皇祖先的遗训，可以说贯穿在时间之古今中，贯穿在空间之东西方中，要弘扬这样的种种道德名目；国民应当借助实践这样的道德向天皇尽忠。“教育敕语”逐渐得到完善、充实，形成日本学校教育的指导精神。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教育行政，在多大程度上浸透到了国民心中？其中的天皇像、天皇制意识，是作为什么样的东西形成的？我想以基督教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尝试说明这些问题。

关于这个时期的基督教，让我们先概览一下。基督教，即使在废除“切支丹禁令”（切支丹【Kirishitan】，葡萄牙语 Christão 的日汉字注音形式，指室町时代末期传入日本的天主教及其信徒——译注）的告示（1873年2月24日）以后，作为同传统习俗、价值观相抵触的东西依然受到人们的冷眼看待。尽管如此，基督教的发展势头，有着切实的长进，十年之间，出现了大约一万新教徒。他们分别居住在开放的港口、重要的都市和农村部分地方。19世纪80年代中叶，在欧化时代的都市，出现了基督教因为是外来宗教的缘故而受欢迎的奇妙潮流；80年代末叶，信徒人数剧增到三倍，各地增设教会以及由基督教系统主办的学校。随之出现了如下的现象：在日本诞生了教派，并且重新组合；新的海外传教士纷纷到来；刊行新的基督教系统的报纸与杂志。同时，也出现了教派之间的对立、基督教在思想上的混乱现象。此外，欧化时代产生反作用，基督教作为背离

日本国体以及臣民道德的宗教而受到非难、攻击；基督教拼命对此做出解释。这决定了教会、学校步入苦难之途，教会发展趋于停止。这种情况出现变化的迹象，是到 20 世纪才开始的。

二、颁布帝国宪法、设立帝国议会

(1) 对颁布帝国宪法的回应

首先，让我们提出如下的话题：联系到帝国宪法的颁布，基督教怎样处理围绕天皇制的各种问题呢？

在发布设立国会的诏书（1881 年 10 月 12 日）以后，政府开展了对起草宪法的调查。社论“宪法调查的传说”（《东京每周新报》，第 5 期，1883 年 9 月 12 日）称：政府“在制定该宪法的时候，召开宪法会议，期望广泛听取人民的建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有利于“官民的和谐”，“重视人民的权利，消除使人民抱有的不满的借口”。议论者明显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但这还是和政府官僚的见解形成了对比。他们全然不考虑召开这样的会议，认为审议草案与人民没有关系。

柴原宗助是备中高梁的追随者。他积极推进民权运动，更加尖锐地追问问题。根据他的讲演笔记：“为社会需要宪法辩护，并论国民约定宪法与钦定宪法的区别”（《基督教报》，第 131 期，1886 年 1 月 29 日），宪法是划定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国家法典，“统治者的权力据此才得到巩固、维持、安稳，人民的自由权利由此获得坚定不移的安全保证”。因此，统治者滥用其权力的现象、人民误用其权利义务的情况才会消失。在制定宪法方面，有两种方法。一是国民约定，即由人民公选的宪法制定委员以舆论为基础制定宪法并经元老院批准、国君认可公布的方法。这种情况下，如果热爱自由权

4 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天皇制与基督教

利的风气盛行，就能够制定一部宪法。它将奠定国家富强的基础，带来国家统治权的扩张、民众福利的增进。与此相对应，“钦定”是“国君及其有司以自己的意志和见识、擅自确定官民权限的”制宪方法；柴原宗助断言说：“想要依据这样的钦定宪法来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依然只是类似于缘木求鱼。”这种评论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即没有把国权（即国家统治权）和民权区分开来。不过，它坚决批判以钦定宪法的方式制定帝国宪法，促进对人民自由权利的自觉。

和这种评论相对照，出现了积极肯定作为钦定宪法的制宪方式的社论。其内容为：“颁布宪法，我谨代表女流之辈祝贺它，希望它圆满成功。”（《女学杂志》，第148期，1889年2月9日）执笔者为严本善治。他紧紧抓住要把女性从封建性的强权政治中解放出来，将男女关系理解为相互扶助的关系。他说：

所谓皇帝陛下钦定国家统治的宪法、使百姓知晓其治理社会的根本原则之事，仅此而言已经是古今稀世的大恩大德也，所以，我们趁还未悉听其宪法的形成经过时，不得不首先尝试仰望这大恩大德，谨表谢意。……

（天皇——笔者）而今又将其统治整个日本的权力分给全体士族与平民，以此使百姓自议、自治、自立、自制；而且，天皇的职能又发展为使他亲自承担宏观治理的辛劳，陛下之光明美德如天之高远、地之深厚……

（国民——笔者）站在陛下面前，等于荫庇在宪法的皇恩之下也。……在此，我等三千九百万臣民拥戴陛下，未必要以圆锥形的形式而是要彼此手拉手形成一大圆环，同时敬仰高高伫立在上天之中的天皇陛下者也。

无论什么人既然都是天皇的“爱子”，男人压迫女人、丈夫压

制妻子的事情，都是“非常不善的恶行”。皇后决心在宪法发布仪式的现场，要毕恭毕敬辅佐天皇。特别要因着皇后，日本女性必须感谢天皇的“大恩大德”。论者如此解释说。

这里提倡的东西，属于儒教式的君主德治论。由于天皇的“大恩大德”，他赏赐给国民宪法，具有辅佐日本全体国民的统治权之道。在此意义上，正如柴原所声明的那样，钦定宪法未能考虑到对国民自由权利的压制之类的情形。这里，我们能够见到经历过自由民权的历史的人与没有经历的人之间的差别。此外，严本从君主善政论（君主善政论，指君主考虑到人民的幸福、社会的福祉的同时，断定是非曲直的良善的政治理论——译注）引出一君万民论，向男性压迫女性的社会潮流发出警告。他按照皇后的举动提倡女性的角色为男性的辅佐者。他有时从自己的逻辑和价值观出发来理解事物，并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事物的方式，屡屡出现在他后来的叙述中。即使在上文的社论中，他也使用自己的逻辑来描绘天皇制，沿着对自身有利的思路解释下去。

从1888年5月到1889年1月，枢密院审议、通过了宪法草案、皇室典范草案。1888年6月，审议了信教自由的法令。从当时的记录来看，法令确认：信教自由涉及到礼拜、传教和演说，信徒的这些行为明确受到制约。佐佐木高行、鸟尾小弥太问到：“一般而言，皇室祭祀虽然和人民没有关系，但有官职的人也不参加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伊东已代治为草案的起草者之一，他回答说：“臣民的权利与官吏的服务规则，属于另外的问题。”据说伊藤博文议长称：这个问题，应当按照当时政治家的判断来处理。他如此把问

题暧昧化，从而结束了辩论。^①

这些审议内容，没有让国民知道。基督教的有关人士所关心的焦点在于：帝国宪法是否给予基督教信教自由？的确，1873年2月24日，废除了“切支丹禁令”的告示。可是，政府明确宣称：它实际上未必是“默许”了基督教，只是对之采取“默认”的态度；它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基督教展开调查（太政类典第二编第251卷9）。^② 1888年9月26日的《基督教报》（第270期）登载社论说：“不知何故，政府在日本国内没有正式承认基督教。”^③ 文章没有署名，是编辑竹越与三郎（三叉）的执笔。^④ 在这封建议书上联名的人，还有联合教会系统的新岛襄、小崎弘道、汤浅治郎等，一致派教会系统的井深梶之助、田村直臣、大仪见元一郎，民友社系统的德富苏

① “枢密院关于信教自由的讨论”（《植村正久及其时代》，新补遗、教文馆，1976，页73-75）。这里应当注意的意见是：甚至在保守派的佐佐木、鸟尾的言论中，都阐述了一般国民即使和皇室祭祀没有关系也不违反臣民的义务。

② 详论参照拙文“天皇制形成时期的基督教——在和人权问题的关联中”（《社会科学》，第29号，同志社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2年1月）。另外，在这篇论文里，笔者把未署名的评论“基督教与皇室”（《六合杂志》，第53期，1885年4月30日）当做植村正久的文章来叙述，但因为考证那是小崎弘道的评论，谨谢修正。拙文“小崎弘道”以此为根据（同志社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近代天皇制与基督教》，人文书院，1996），论述了本章未处理的小崎的见解。

③ 基督教的官许建议书的相关资料与提要，参照杉井六郎校注“小泽三郎编日本新教史史料——基督教官许的建议”（一）、（二）（《基督教社会问题研究》，页35-36，1987年3月、1988年3月）。

④ 根据现存的《东京第一基督教会会员簿》记载：竹越与三郎于1886年8月1日由小崎弘道受洗。他是《基督教报》第259号（1888年7月11日）至第281号（1888年12月12日）的编辑。

峰、竹越与三郎。^① 建议书的篇幅相当长，其宗旨明确。在废除“切支丹禁令”的告示后，基督教也受到各种各样不正当的对待。这种现象，现在已经消失了。

基督教徒已经可以成立公开的组织，进行公开的传道，具有公开的建筑物，得到知识界舆论的支持。此时，政府对其正式的承认，只不过是承认实际上正在盛行的东西（事后追认说），只不过是要证明（许可）习惯上正在默许的内容。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要对其正式的承认，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

这个建议立论的展开，与其说是基于所谓信教自由的近代市民国家的逻辑，不如说是出于当政者的构想，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正式承认乃为上策。这说明当时教会的性质：基督教的领袖多是士族出生。可是，政府不可能采纳这类民间的建议，何况是在审议信教自由的会议刚结束后。在基督教界，好像流传着这样的风声：政府在公布宪法的同时，要发表正式承认基督教的文书（“关于正式承认基督教的风声”《东京妇人矫风杂志》，第10期，1889年1月19日）。

帝国宪法颁布的第28条为：“日本臣民限于不损害安宁秩序以及不背离作为臣民的义务，享有信教自由。”根据伊藤博文的《帝国宪法解释》（1889年6月），因为人的本心的自由处于国家政治干涉的领域之外，所以，无论如何，国家法律都不能涉入其中。可是，当人的本心面对外部世界，涉及到礼拜、传教、集会、结社的时候，这些活动就要受到制约。议论者竭力把信教自由纳入内在性的范畴，把外在性的宗教活动归入信教自由的框架外。但是，要区别内在的信仰与外在的宗教行为是困难的。例如，教育是国家的权

^① “各报关于基督教官许建议的意见”（《基督教报》，第271期，1888年10月3日）。

限、国民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无所制约地强化天皇制教育，客观上就成了对教师和学生的内在性的东西的侵蚀。此外，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信仰隐藏在心里。这样的信仰，必然都会以或多或少的形式表现为外在的行为。在信教自由的范围里，存在着这样的困难问题。

但是，当时的基督教领袖们没有工夫考虑上述问题。首先，他们期待着帝国宪法的发布本身。“不管其颁布的宪法的性质如何，这都是标志着日本第二次维新的东西，它将转换国家的结构、重新建立立宪制度。假如作为日本国民，有谁不会欢喜呢？”（“帝国宪法的发布”，《基督教报》，第289期，1889年2月6日）不问宪法的内容如何，基督教领袖们对颁布宪法的感动的情景，和前面引用严本的描述相吻合。

因此，他们知道宪法明确记下了“信教自由”的条款后，在各地举办了发布宪法的庆贺会。例如，在东京木挽町厚生馆，各派联合举办庆贺会，参加者相聚满堂。会场正面，挂有红彤彤的关于太阳的绘画、“信教自由、皇位万岁”的黑字，左侧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宪法第28条。横井时雄的布道，井深梶之助、平岩恒宝的演说，他们的意图，都是要阐明官方承认基督教和以此为基础的使命。^①这次庆贺会的出席者，共同的心情是欢喜和感动，原因在于：基督教作为明治维新当初禁令的对象，约二十年后获得了信教自由。在本年度的天长节（1889年11月3日，天皇生日日的旧称。——译注），井深发表演说，称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自然的，而是出于“全知全能的上帝的神意”和“我天皇陛下的仁政”，“只能祈祷天皇万岁”

① 〈厚生馆宪法发布庆祝会的景况〉（《基督教报》，第290期附录二，1889年2月13日）。另外，平岩的演说刊载于《东京妇人矫风杂志》（第12-13期，1889年3月16日、4月20日）。

(“王政维新以来信教自由之进步”，《六合杂志》，第107期，1889年11月15日)。观察这种论述就会发现：上帝的神意与“当今在位皇帝的保守”，在赋予信教自由这个事件上两者的功能处于完全重叠的地位。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类似如下的论调，即以所谓上帝支配着世界的神意的信仰逻辑，来解释天皇君临日本的太平盛世。不过，这部帝国宪法带着强烈的宗教性，甚至可以说是天皇教的东西。据发布宪法时的“告文”：该宪法是皇祖皇宗作为遗训传承给他们后裔的东西，它的颁布称得上是神助的恩赐；按照“敕语”，由于天皇从祖先秉承大权，它是作为“不朽的大典”而发布的。当时的基督教的领袖包括井深在内，没有人论述过在帝国宪法发布之际天皇的这种宗教性权威和在天皇制下信教自由的问题。^①

发布宪法当日早晨，文相森有礼遭到西野文太郎刺杀。西野的想法是：听说森有礼在伊势神宫有不敬的行为，不要让这样的人参加颁布宪法的典礼仪式。森对基督教抱有好感，这也是他遭遇刺杀的一个原因。《贝尔兹日记》写道：“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节日因为发生了不祥的事件而削弱了气氛。”文章“森文部大臣的去世”（《基督教报》，第290期附录二），尽管是接着前面厚生馆的庆贺会继续报道，但它还详细传达出当日刺杀的经过，结尾说“以至应当为国家悲哀”。此外，“不健康的感情”（《基督教报》，第297期，1889年4月3日）评论说：报纸、杂志频频刊载称赞西野行为的消息，提出很多人正前往他的墓地参拜，表扬刺杀大臣的罪人，这些都是不祥、不

① 根据塚田理氏的考察，E. 塞勒（Edward W. Syle）曾经把稿子“关于日本的预想”投给英国圣公会宣教协会（CMS）的机关刊物《英国圣公会宣教协会通讯》，XIV，1889，指出帝国宪法所说的天皇的神圣性的危险性，叙述说日本的基督教因与国家神道妥协也许会丧失自己独特的信仰特征（《日本圣公会的形成与课题》，圣公会出版，1978年，页53-54）。

健康的感情。可是，更重大的事情，岂不是参拜神宫和基督教的问题吗？森仅仅就作为和基督教具有关系的人而遭遇刺杀，原因便非常简单。“为森有礼君哭泣吧”（《女学杂志》，第151期，1889年3月2日）也愤怒谴责说：“刺杀为自由之敌”，感谢森热心于女子教育。不过，关于森有礼的国家主义的教育行政，却什么也没有叙述。

让我们也接触一下基督教对皇室典范的见解。皇室典范被认为是万世一系的天皇基于祖先的遗训、亲自制定的皇室的家法，帝国议会也不能对之加以干预。它未作为法令在公报上刊载出来。然而，一些基督教徒提出女帝论，大胆直逼皇室典范。根据皇室典范第一章第一条，严本善治断言：“今后日本帝国的皇统就会全限于男系，甚至已经无争论。”（“皇室典范”，《女学杂志》，第150期，1889年2月23日）并且，该杂志有文章指出：各国王位继承法中有承认女帝的事例，日本也曾经出现过有德行的女帝，英国女王君临统治也没有什么危害，J. S. 密尔论述女王太平盛世必多太平，因此再次得出结论说：“禁止女系登基原因何在？许多报刊记者对此解答曰不知其理由。”（“皇统中的男女之别”，《女学杂志》，第150期，1889年2月23日）此外，又有文章提出“嫡子”、“庶子”问题，准许“嫡庶”无别地继承皇位的现象，只限于一夫多妻的国家。这种说法，暗暗地要指出皇室典范的问题所在（“嫡庶”，《女学杂志》，第150期）。《东京妇人矫风杂志》（第12期，1889年3月16日）的报道，不像严本那样激烈。其标题为“不让皇统传给女帝”，阐述了作为摄政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具有了如下视点即热心于要确立女性的地位、一夫一妻制的问题而展开的人们的评论。基督教系统的其他报纸、杂志，没有提到上述问题。

（2）关于君权神授说

随着宪法的颁布，制定和公布了各种法律。其间，围绕公布民法的问题，1889—1892年产生了对民法典的争论。以穗积八束为

中心的东京大学法学士会，声明“民法出、忠孝亡”，说民法会破坏日本社会的伦常，主张延期实施。1892年，他们发表的意见书（《法学新报》，第14期）写道：日本是祖先崇拜的国家，以此为基础而有家族父权的尊严、天皇统治大权的神圣性；论断说基督教因为倡导在基督面前人人平等、博爱，因此是不承认祖先崇拜、君主的神圣、破坏日本的伦常的宗教。对此，杂志《护教》与原田助加以反驳。^①《护教》认为：法学士们没有区别宗教与法律，不知道真正的基督教；反驳说：要是他们如此主张祖先崇拜的话，进化论者传授祖先崇拜也就变得虚伪了。并且，基督教徒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会尊敬君主、大人和父亲。原因是耶稣为真理的化身，忠孝就是真理。因此，对耶稣表现出绝对顺从的人，在生活中才会真正以忠孝为美德。原田也抱有大致相同的见解：“人伦乃社会之大道、忠孝乃上帝之天法。它们比不上教导人是非的基督教。果真那样的话，基督教就不是破坏忠孝的东西，而是兴起日本未来的伦常之道。”两者都共同先验地承认忠孝为真理之大道，赋予基督教以作为成全忠孝的宗教之地位。其原因并不清楚：是因为基督教不可能超越儒教的传统？还是为了使基督教迎合当时的社会风潮？或者两者兼而

① “法学士的无耻”（《护教》，第46期，1892年5月21日）、“辩妄第一法学士要教导伪善乎”（同上，第47期，1892年5月28日）、“辩妄第二宗教性的个人主义”（报纸同上，第48期，1892年6月4日）、原田助“基督教破坏人伦乎”（《基督教报》，第462期，1892年6月3日）、原田助“读法典延期意见书、为基督教辩护”（《国民之友》，第157期，1892年6月13日）。原田的两篇评论，几乎都是同一篇文章，但在后一篇评论中有补充。本文引用依据后者。